

#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史:类型、特征及走向

郭景川 申国昌

**【摘要】** 为了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频繁交往、相互合作,形成了良好的交流互动氛围。不仅体现在公共教育事务的互援互助、群策群力,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关心提携、情感交流,由此建立和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教育交往网络。就交往类型而言,民国教育家的交往活动概括起来可分为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种。相较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教育家之间基于共同教育志趣的志缘交往更具持久性。教育家的教育交往网络也并非封闭、排外的,而是开放、包容的。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及教育研究的深化,教育家的交往活动由以地缘交往、学缘交往为主,逐渐向崇尚志缘交往转变,志缘交往成为民国教育家积累学术资本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教育交往史

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活动方式,交往对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sup>①</sup>,高度概括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充分肯定了交往对个人本质实现以及自由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群星璀璨的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人际互动。通过这些交往,教育家们相互影响,彼此认可,共同进步,有效地实现了身份的认同、思想的升华、精神的充盈,使教育家个体成功迈向社群生活,进而形成相对稳固的教育学术共同体,为实现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总结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类型和特征,分析交往活动的发展走向,有助于从整体把握民国教育家的交往互动、共生共进,充分认识教育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于理解作为主体的人在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品质,进而对促进当前教育学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交往以及教育家的成长提供历史的借鉴。

## 一、多元多样:教育家交往活动之类型

作为参与教育交往活动的主体,教育家归属于各个交往网络,时刻进行着交往活动。<sup>②</sup>在文化多

---

郭景川,教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新乡 453007);申国昌(通讯作者),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本文系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学校日常生活史研究”(SK02072018-0265)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5页。

<sup>②</sup>中国昌、吴艳君:《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教育交往史研究的启示》,《现代大学教育》2019年第4期。

元、社会转型的民国时期,纵观教育家的交往活动,呈现多元化特征,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不同教育家每一种交往在交往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比重有所不同,仅就同一教育家而言,三种交往所占据比重也不尽相同。

### (一) 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地缘交往

地缘关系是一种类血缘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其视为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sup>①</sup>以区位而形成的这种地缘人际关系,无形中打上了血缘关系的烙印。清末民初就已投身教育实践的教育家,往往多以地缘交往为主,如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等教育家。蔡元培在清末以教育活动作掩护来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为此结交了李慈铭、张元济、蒋维乔、杜亚泉等一批江浙地区教育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缘交往网络。随着民国肇建,这批教育家最先登上民国教育舞台,并成为引人瞩目的教育精英。蔡元培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旋即电邀诸多浙籍俊才加盟教育部<sup>②</sup>,后其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也是被沈尹默、马幼渔、周树人、沈兼士、钱玄同等浙江籍青年英才所“包围”<sup>③</sup>;

黄炎培同样颇为注重地缘交往网络的构建,自1902年与同乡张伯处、陆逸如等人联名上书川沙厅请求将观澜书院改办成川沙小学堂并取得成功后,就在办理川沙小学堂的过程中初步构建起地缘交往网络,不仅在当地获得声誉,还得以结识川沙同乡、以“毁家立学”闻名于世的上海建筑界领袖人物杨斯盛,后杨又把浦东小学、浦东中学的筹办诸事交于黄炎培,黄炎培对杨也格外敬重,“朝夕侍先生”<sup>④</sup>,感情甚笃。后黄炎培又与江苏政商学界宿儒张謇、沈恩孚、袁希涛等人相识相交,建立紧密联系,进入江苏教育界的主流圈子。这种联系无疑是以地缘为基础,依靠同籍前辈教育家、实业家之协助,踏上教育生涯中关键性的一步。

### (二) 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学缘交往

学缘交往是以同学、校友、师生、学校同事为基础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是教育家重要的人际交往活动。以学缘交往活动为主的教育家,大多数从海内外著名大学毕业或在国内著名大学执教,因为名校往往是名师聚集、精英荟萃之所,为教育家构建广泛的学缘交往网络提供了先天优越条件。众所周知,郭秉文、陶行知、胡适、梅贻琦等留学欧美的教育家,早年大都在国内著名学校就读,求学于名师,后又出国深造,归国后任职于各大高校,以此为依托施展才华抱负。他们有的在青年求学时代既已缔结同窗之谊,或与师长保持真挚的师生情谊,学缘交往在他们学术学业成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素有“哥大情结”的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校长以及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时,曾专门赴美物色优秀留美学生,尤为青睐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留学生,盛情邀请他们加盟南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不少人由同学关系进而又结成同事关系,使得他们在学校的教育改革中易于达成共识,特别是郭秉文和陶行知这一对同门校友,有学者把他们称之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对奇妙的组合,“在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上目标和理念高度一致,在行为措施上相互配合”,“促使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新教育潮流,取得了当时中国教育上登峰造极的成就”,<sup>⑤</sup>从教育改革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8页。

②高平叔、王世儒:《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③沈尹默:《我和北大》,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④黄炎培:《杨斯盛先生言行记》,《申报》1908年6月8日,第4张第2版。

⑤储朝晖:《郭秉文与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互动与选择》,《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的后世影响上来看,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和颇有见地的。这种由同门校友又转变为同事关系的学缘交往所产生的合力,对教育家双方的学业事业发展可谓助力不少。此外,教育家青年时代与同窗学友的交往同样是他们人生当中靓丽的风景,渗入他们富有理想、充满朝气的学校日常生活。恽代英与同期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习的同窗、以在近代教育史上力倡收回教育权而著名的近代教育家余家菊的早期交往,同学、同事四年结下了“弥足珍贵的”“比较深厚的友谊”,虽然“五四运动”后两人思想发生了分歧、所走的道路迥异,但“青春时期的同学情、同事情还是难忘的。”<sup>①</sup>这种青年时代的早期交往,也对教育家各自教育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产生着很大影响。

### (三) 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志缘交往

所谓志缘交往,是以共同的志向目标、趣味爱好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交往关系。共同志趣是民国教育家彼此之间互联互通、普遍接触的基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在不同领域,教育家思考的问题、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或力倡职业教育,或鼓吹高等教育,或宣扬科学教育,或着眼乡村教育等等,这些关注重心的同否成为他们开启交往合作大门的黄金钥匙。以志缘交往为主的教育家往往善于与志同道合者进行互动,善于凝聚和依靠社团力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如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就属于志缘交往活动为主导的教育家,他们分别主要依靠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与教育界同道开展广泛的交往与互动,围绕着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和社团,建立了稳定而广泛的朋友圈,<sup>②</sup>并由此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为推动民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领军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和晏阳初从相遇到合作,广泛联络教育界人士,积极成立实施平民教育的“大本营”中华平民教育会总会,促成了“全国平民教育高潮的到来”<sup>③</sup>,对近代教育的普及起到很大作用。梁漱溟与陶行知的交往同样因共同的教育志趣而产生,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友谊,直到晚年梁漱溟仍对这位昔日的教育同道充满怀念,把他视为平生“衷心折服”的三位“盖世人物”之一。<sup>④</sup>相同的志趣爱好使教育家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由较为分散的个体聚结成具有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教育交往网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家个体方面的局限性,形成了基于共同教育志趣的教育联合体。

以上是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类型的基本概括,对于任意一位教育家来讲,不可能单纯按照某种类型进行交往,大部分教育家三者兼顾,且不少教育家无论是地缘交往、学缘交往,抑或志缘交往,均构建了广泛的教育交往网络,如蔡元培和黄炎培两位先生,堪称三种教育交往活动的集大成者,每一种类型的交往都占据着重要位置。相比而言,拥有较大志缘交往网络的晏阳初、陶行知在地缘交往方面则略显不足,这恐怕既与晏、陶二人长期在外求学、工作、奔波有关,又与民国时期川籍、皖籍教育家比之于浙籍、苏籍人数为少不无关系。另外,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具有易变性和多样性,致使三种交往关系彼此交叉、重叠、转换,甚至在交往者身上可以同时存在。譬如,陶行知和早期交往较多的胡适,既是同乡同学,亦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同仁;陈鹤琴和终身保持着密切交往的张宗麟,既是同乡、师生,又是鼓楼实验幼稚园的同事、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同道,多重身份使得教育家彼此间颇为熟悉、联络方便,也使得交往关系愈加多元多样、错综复杂。

<sup>①</sup>李天华,李良明:《余家菊与恽代英在中华大学的友谊》,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余家菊与近代中国教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4—274页。

<sup>②</sup>申国昌,郭景川:《生活史视域教育家交往活动审视——以陶行知社会交往个案研究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sup>③</sup>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sup>④</sup>梁漱溟:《忆往谈旧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 二、开放延展: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之特征

民国时期教育家的交往活动除了拥有人类实践活动一般性的特点,如目的性、能动性、客观性外,还体现出自身在特殊历史时期教育交往活动的个性特征,考察这些特点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全貌,进而充分认识教育家在近代教育变革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活动主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

### (一) 交往方式的开放性

教育家善于利用多种渠道、途径与其他教育家交流联络,以沟通感情、交换意见、合作共进,既有在场性交往,亦有跨时空交往。受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民国时期教育家最常使用的交往方式是面对面的言语对话与交流,这也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除私人谈话外,在场性交往中也会采用开放的交流方式,如演讲论辩、参观考察、会议论坛等。这种在场性交往方式不仅能直接捕捉和感知对方的话语含义、情感态度,而且易于进行深度交流。当然也有诸多跨时空交往方式,如信函、电报、电话、报刊上论学等,它突破了空间局限,跨区域传递信息,但也存在信函邮寄过程中丢失或无法准时送达导致信息延误的风险。故此,民国很多教育家书信往来中,信函寄送出去后未得到对方复信时,一般会再发一函相寻告。民国教育家不拘泥于一种或两种交往方式,通常多种方式综合使用、灵活运用。当能够进行身体在场式的交往时,则直接和对方交流互动,否则会采用跨时空方式。譬如,胡适就颇热衷于与其他教育家和全国各地青年书信联络;常年在外奔波的陶行知也经常和家人、朋友、同乡、同事写信,倾诉亲情、诉说思念、问候致敬。而有的民国教育家书信使用得相对较少,如陈鹤琴与其他教育家的往来书信就较为少见,一方面由于他的工作地域相对固定,与主要交往对象相距较近,便于面对面交往;另一方面他所主持的《儿童教育》杂志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也成为他与教育同道交流联络的稳定交往平台。

### (二) 交往对象的多样化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对象范围甚广,上至手握重权、称霸一方的军政要员,下至布衣芒屨、老幼妇孺的平民百姓,几乎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年龄阶段,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教育家身上得以体现。就交往对象为教育家而言,所交往的教育家也涉及众多教育领域,不独与相同教育领域的教育家交往,而且还与其他教育领域、其他教育流派的教育家有往来。如张伯苓与晏阳初,前者致力于高等教育管理与研究,后者则专注于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两人从事领域不尽相同,然而张伯苓曾数次致信晏阳初向其推荐南开毕业生或者引荐参观团,<sup>①</sup>实因张伯苓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初建时的九大执行董事之一,二人因而缔结交往关系。与不同类型的教育家交往,为教育家处理教育事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积累了丰厚的人际资源,影响力不断扩大。之所以呈现多元的特征,是因为民国时期异常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态,使教育家的交往既不能局限于特定的教育领域,又不能拘泥于固定的地理区域,而是尽可能多地与其他教育家广泛交往、彼此合作,以谋求艰难时局中教育之改进,此其一;近代邮政制度的创建及邮政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民国成立后全国邮路的进一步发展,书信邮寄变得相对便捷,古人“寄书长不达”<sup>②</sup>、“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

<sup>①</sup>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385、470页。

<sup>②</sup>杜甫:《月夜忆舍弟》,张忠纲选注:《杜甫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3页。

是明年事”<sup>①</sup>等情况相对来说已经十分少见,这无形中促进了教育家彼此间的信息联络,使得书信往来普遍存在,此其二;民国教育家自身大都具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善于通过多种方式与不同类型的教育家进行交往互动,这也促成了教育家多样化教育活动的形成,此其三。总言之,教育家交往活动多样化,充分显现出民国教育家教育生活的丰富性和他们为了教育事业发展而鞠躬尽瘁、不畏辛劳的崇高品质与教育情怀。

### (三) 交往网络的延展性

教育家并非生而成之,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与同行共进合作,在教育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开疆拓土,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起丰厚的声望资本,逐渐成为被世人称颂与景仰的教育大师。民国教育家所构建的复杂而庞大的教育交往网络亦并非自其一踏入教育界就迅速形成,乃是随着他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大,交往网络从最初身边数人逐渐向外拓展,接触之人愈来愈多,社会声望愈来愈著,表现出很强的向外延展性。与此同时,交往网络中的中间节点也愈加密集,这些节点既可以是物、是事,也可以是个人、是团体,它们皆在交往网络拓延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之作用。

地缘关系网是一个拥有高度辨识符号的人际关系网络,教育家在地缘交往网络的构建中,先从与身边容易接触到的教育家交往起步,而后延至本省之教育家、全国同籍教育家,由近及远向外拓展,像石子投入湖中产生的波纹一般愈荡愈远。<sup>②</sup> 沈尹默与蔡元培的交往即是如此。沈尹默先经由同乡许炳堃之介绍,得以认识同籍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北大预科任教,后何、胡二君又向蔡元培盛情荐举沈尹默,沈进而受到蔡之礼遇。<sup>③</sup> 学缘交往与此类似,学缘交往网络先以求学时代的同窗为基础,再向外扩散至校友群体,往往以校友会方式保持联络。志缘交往网络的覆盖面虽不及前两种交往网络有便于辨识之符号,民国教育家的教育关注点也常常随社会形势变化而变化,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延展性。不少教育家即使在交往中曾有过分歧,但为了共同的学术追求与教育理想,也会澄清误会、摒弃前嫌,恢复人际交往与学术联系。

教育家的交往网络也是动态扩大的过程,随着他们交往活动的增加,交往圈不断扩大。交往活动对外延展的动态演变,对教育家的成长具有积累人际资本与学术声望的社会学意义,对教育家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引领教育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社会学领域把学缘关系看作一种代表着地位、学识的象征资本,是名牌学校塑造国家精英、赢得社会声誉的常用关系符号。<sup>④</sup> 事实证明,民国时期诸多任职于国内著名大学的教育家因其学缘交往网络的扩大,逐渐积累了丰厚的象征资本。这或许是民国时期报刊经常刊登教育精英学术文章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便于在学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其象征资本。蔡元培就是在读到梁漱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后对梁颇为赏识,后经范源廉引荐,梁漱溟登门拜谒蔡元培,当即被聘入北京大学任教。<sup>⑤</sup> 另一方面,教育家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也使得教育家的人际交往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既影响着教育家的个人行为,也影响着交往网络中的集体行为。民国时期教育家教育交往网络延展性既有其自身内在的运行规律,也离不开教育家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建构。无论是因地缘,还是学缘、志缘所构建起的交往网络,民国教育家的教育交往网络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sup>①</sup> 陆游:《渔家傲·东望山阴何处是》,邹志方选注:《陆游诗词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03页。

<sup>②</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sup>③</sup> 沈尹默:《我和北大》,第22—28页。

<sup>④</sup> [法]P.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9页。

<sup>⑤</sup>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年,第97—98页。

### 三、崇尚志缘:从传统关系性交往走向现代学术性交往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转变,反映出教育家的人际关系与交往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即由传统社会中以地缘、学缘等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关系性交往逐渐向现代学术中以思想认同、教育认同、理想认同为基础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志缘交往转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变迁的映照与社会转型的反映。

#### (一) 志缘交往是民国教育家积累学术资本的重要方式

由传统的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是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走向。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艰难境况,一大批有识之士深怀教育救国之志,试图通过教育来开启民智、培养健全国民,以使民族走向独立、国家走向富强。“教育救国”是以教育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普遍处于政治权力缺位时,试图通过振兴民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来达到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救亡图存之目的的教育行动。尽管历史雄辩地证明“教育救国”运动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近代社会并不能像革命那样暴风骤雨式地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但为了“救国”之理想,他们还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力和智慧,开展了众多的教育实践活动,其中包括教育实践衍生品的教育交往活动。实因教育家彼此间并不是为了交往而交往,而是为了相似的目标和追求而交往。尽管教育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交往类型所发挥的作用和占据的位置各有不同,但近代以来尤其进入民国后,随着欧风美雨的激荡,教育家的交往方式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交往方式的深刻影响。不同于中国古代教育家以传统的地缘、学缘交往为主,民国教育家更为重视和追求与志同道合者的志缘交往。这些丰富的志缘交往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他们积累丰厚学术资本、获得教育界认可和传扬,由平凡走向伟大最终成为著名教育家的显著特征。

#### (二) 受现代观念影响从传统关系性交往转向现代学术性交往

新文化运动前,教育家的交往活动多以地缘、学缘交往为主,通过结交同乡、依靠同乡,来构建自己的教育交往网络,逐步积累起最初的教育声望和地缘人际资源,这些地缘人际资源也成为他们进入教育界后担任重要职务的因素之一。如民元蔡元培得以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除个人威望、深厚学识外,还与同乡著名革命家、教育家章太炎之推崇、助力不无关系。<sup>①</sup>当教育家进入工作场域后,同乡关系依然发挥着作用,甚至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同事关系,成为“同袍”,在日常工作中彼此支持,相互帮助。然而,由于同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务性、利益性关系,当同事之间因个人利益发生龃龉,或个人利益与教育界整体利益、社会利益有所矛盾甚至对立时,同事间随时可能因利益纷争导致疏离、冲突而中断交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西方科学民主意识、西方生活方式、现代交往方式等陆续传入我国,传统社会中用以规范、调节、支配人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受到严重冲击,“三纲五常”逐渐被自由、平等的理念所取代。对教育家而言,学术研讨、言论自由成为一种交往时尚,集会、结社、演讲、办报蔚然成风,或抨击传统教育弊端,或改良教育管理体制,或鼓吹传播西方思想学说,教育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格局。在此情形下,教育家的交往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与转型,他们不再局限于与地域相近之人交往,亦不再拘泥于与老师、同学、学生之间的协作,而是转向与更广阔的教育学术领域、教育实践领域有共同志趣爱好的教育家之间的交往合作,携手创建了

<sup>①</sup>《章太炎宣言》,《民国报》1911年12月1日,第2号。

大量现代性教育社团。在社团活动中,作为极具独立个性、理性思维和批判意识的知识群体,他们经过理性、民主式的商议、讨论,掀起了具有批判性、创新性的教育理论思潮和教育改革浪潮。

### (三) 以志缘为基础构建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教育交往空间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把具有私人化的资产者个体聚集起来,从各自所拥有的价值、信仰和良知出发,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开讨论”所形成的舆论称之为“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概括和反映了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虽“没有统治力量”却对行政权力有着深刻影响,“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sup>①</sup>,这就使得宣称具有合法性的行政权力认真考虑和重视公众舆论并加以合法化。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尤其是群体性的学术交往活动来探讨教育公共问题和哈贝马斯所说的情形颇为相似,在讨论教育公共事务与公开理论方面形成了类似哈贝马斯所说“公共舆论”的教育交往空间<sup>②</sup>。对此,许纪霖也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通过学校、报纸、学会以及集会、通电等,“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sup>③</sup>确实如此,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特殊背景下,民国教育家为了民族命运、教育前途频繁互动,积极参与教育公共事务讨论,显现出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迥异的志缘交往活动。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包括教育家在内的有志之士因反抗外敌入侵、反抗日本奴化教育、倡导战时教育而结成的教育同盟,如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等,进行了愈加频繁的志缘交往活动,讨论和参与战时教育公共事务,引领战时教育公共舆论,构建了颇具规模和影响的教育公共空间。

### (四) 多元性交往活动中志缘交往具有较高的优势性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之转型不是线性式的单一转型,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教育家的三种交往活动依然同时并存,但逐步突显出崇尚志缘交往的基本趋势。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和志缘交往活动都有其各自特点。地缘关系本身与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亲近感,能使本不相识的教育家建立起最初的人际联系和信任关系,显示出较强的淳朴性。学缘交往具有情感衍生的作用,交往双方会因授受关系而孕育浓厚的师生情谊、因朝夕相处缔结纯真的同窗友谊,这种学缘情谊是他们保持教育交往的情感基础,彰显出真挚的情感性。但是在近代风云诡谲的时局中,这两种交往活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诸多教育家常年奔波在外,活动区域逐步扩大,地缘联系在交往网络中的联系度却愈来愈低,关系愈来愈远。<sup>④</sup>民国教育家除师生间常常能保持长久、密切的交往外,在校园中曾缔结的真挚同学关系也会随着毕业分离而变淡,或随着两人思想、地位、价值观的发展出现分歧而渐行渐远。比较而言,民国教育家因共同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而建立的志缘交往关系则具有较强的共同奋勉的持久性。如陶行知与陈鹤琴二人,既是同事,且有共同的志趣、一致的追求,几乎毕生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因共同志趣而成为亲密的同道,所建立的是一种学术情谊、教育情谊,颇为纯粹,参杂的世俗、政治、个人偏见等因素相对较少,往往为了共同目标,长期交往,精诚合作,携手共进。

①[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②郭景川,申国昌:《民国时期儿童教育学人的教育交往空间——以陈鹤琴及中华儿童教育社为考察中心》,《学前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

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④张立程:《由名片所见黄炎培在近代的社交网络》,《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综上所述,当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内化成交往活动的自觉意识时,交往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便会潜移默化地呈现。这些交往活动构成了他们教育生活的精彩篇章,丰富和助推各自的人生事业,彼此间的互动合作对民国时期教育变革与发展产生着重要推动作用。民国教育家之间能否良性、有效、持久地互动,影响因素颇多,既有国家层面的又有地域、个人层面的,既有外在客观的,又有内在主观的,诸多因素交揉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多维、动态、复杂的“教育交往活动场”。在大力呼吁和倡导教育家办学的今天,教育家的成长问题以及教育家彼此互动、联合办学、学术交流、协同创新等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和学界重视。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廓清教育家之间的人际关系,了解彼此间的深情厚谊,而且可看出教育家交往互动与教育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进而更好把握教育发展需要多方协同配合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在当前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教育学者应重视并善于和国内外教育界同仁交流合作、交往互动,应树立潜心为学的志缘交往观,树立以促进学生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旨归的教育发展观,崇尚社群性教育生活,积极构建教育共同体,努力开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局面。

(责任编辑:蒋永华)

##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ors in Modern China before 1949: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GUO Jingchuan, SHEN Guoch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educators in China before 1949 interacted and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ey not only supported each other on the public education affairs, but also helped each other in daily life, thus maintaining 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 wide and complex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had thus been built. On the who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as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foundation: i. e. they develope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due to shared geopolitical, scholastic, or professional common grounds. Compared with geopolitical and scholastic common ground-based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educational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was more durable.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ose educators is that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y built was open and inclusive. What's mor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factors susta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changed from geopolitical closeness to shared educational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m to accumulate academic capital.

**Key words:** period before 1949 in China; educators;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authors:** GUO Jingchuan, PhD in Education, is Lecturer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 SHEN Guochang,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